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一卷

〔日〕远山茂树 著 商务印书馆

K313.4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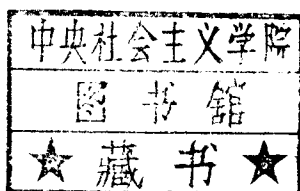
55854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一卷

〔日〕远山茂树 著

邹有恒 译



200226068

商务印书馆

1983年·北京

日本近代史 I

远山茂树 著

据岩波书店 1975 年 6 月版译出

日本近现代史

第一卷

〔日〕远山茂树 著

邹有恒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统一书号：11017·615

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1983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字数 151 千

印数 10,100 册

印张 6 1/2

定价：0.84 元

译 者 的 话

本书比较系统、全面地阐述了从明治维新直到战后1960年为止的近百年来日本近现代史的发展过程。在当前许多日本近现代史的著作中，这是一部简明扼要而又反映了新近研究成果的著述。

作者引证较多的文献和史料，并结合历史发展情况，揭露了一些过去讳莫如深的史实，因此，本书对我国日本历史工作者具有一定参考价值。我们所以合译此书，目的就在于此。

本书共分三卷。第一卷由远山茂树撰写，从明治维新起叙述到日俄战争为止；第二卷由今井清一撰写，从日俄战争后叙述到九·一八事变前夜为止；第三章由藤原彰撰写，从九·一八事变叙述到战后1960年为止。本书阐述的日本近百年史，包括从日本开始走上资本主义道路，并逐步发展成为帝国主义直到天皇制法西斯主义败亡的历史，以及经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占领时期的一系列改革，日本又成为举世瞩目的所谓“经济大国”的历史，这是日本历史上最为激烈的动荡时期。

本书第一卷作者远山茂树，1914年生于东京市。1938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国史学科毕业，先后在文部省维新史料编纂事务、东京大学史料编纂所和战争历史学研究会工作。从1958年起任筑波大学教授。他主要研究明治维新史、自由民权运动史以及近代政治史，主要著作有《明治维新史》、《日本历史讲座》、同石母田正、高桥硕一合著《世界历史：日本》，同今井清一、藤原彰合著《昭和史》、《战后的历史学和历史的意识》、

《明治维新和现代》等。本书第二卷作者今井清一，1924年生于前桥市。1945年东京大学法学部政治学科毕业，现任横滨大学教授。他主要研究日本近代政治史，主要著作除同远山茂树、藤原彰合著《昭和史》外，还著有《大正民主政治》等书。本书第三卷作者藤原彰，1922年生于东京市。1949年东京大学文学部史学科毕业，1959年任东京大学讲师，现任一桥大学教授。他主要研究近代史，主要著作有同远山茂树、今井清一合著的《昭和史》等。

本书是按1975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最新版本译出的。

因限于水平，译文中不妥之处，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惠予指正。

189/32 10
32
目 录

序言	1
序章 明治维新的特殊性质	3
印度佣兵之乱与太平天国	3
列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	4
攘夷的原则化	6
尊王与民众	8
幕府崩溃的意义	11
军国主义的早熟	12
财政和振兴产业的矛盾	13
富国强兵的困难	16
第一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发展	23
第一节 修改施政方针的摸索	23
颁布三项新法	23
教育令及其修改	25
天皇亲政和整顿军制	27
冲绳的归属	28
第二节 开设国会运动的高涨	33
爱国社的重建和国会期成同盟	33
豪农的民权	35
民权派的宪法草案	37
第三节 明治十四年政变	43
政府的消极态度	43
开拓使出售官产事件	45
政变后的政策	46

政党的建成	49
第二章 自由民权运动的败退	55
第一节 军国主义的促进	55
朝鲜的壬午事变	55
福岛事件	58
自由党与困民党	60
第二节 各种事件的激烈化	65
自由党的解散	65
秩父事件	67
自由民权运动的意义	69
第三节 钦定宪法的制定	74
甲申事变	74
侵略的国内舆论	76
修改条约问题和大同团结运动	78
制定宪法的准备	80
宪法的颁布	83
第三章 天皇制的矛盾和甲午战争	88
第一节 明治宪法的性质	88
宪法与天皇制	88
政党的反应	90
颁布教育敕语	92
神道和基督教	93
第二节 初期议会的官民对立	99
第一届议会的动向	99
对选举大加干涉	102
寄生地主制的形成	105
第三节 明治政府末路之一战	111
扩充军备的诏敕	111
防谷令事件	113

对外强硬论的反政府联合	114
开战外交	116
第四节 甲午战争的结局	121
战斗与媾和	121
三国干涉与台湾、朝鲜	123
甲午战争的性质	125
第四章 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	131
第一节 扩军政策的矛盾	131
超然主义的修改	131
政党内阁的诞生	134
增收地税和政友会	136
第二节 外交政策的混乱	142
战后的朝鲜政策	142
义和团事件	145
扩军财政的危机	148
第三节 民众和知识界的动向	151
佃农和工人	151
工人运动和知识分子	152
社会主义的诞生	155
帝国主义思想的流行	156
第五章 日俄战争的意义	161
第一节 向开战突进	161
日英同盟的缔结	161
对俄交涉的紧迫	163
开战论和反战论	165
第二节 战斗的经过	169
日韩议定书的签署	169
攻占旅顺和奉天会战	171
战时下的国民	173

第三节 缔结媾和条约	176
朴茨茅斯会议	176
日比谷骚动事件	179
人名索引	186
事件索引	190

序 言

这部《日本近现代史》(第一卷)从幕府末期叙述到日俄战争,同续刊今井清一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二卷藤原彰著《日本近现代史》第三卷合在一起,试图概述从明治维新到战后的日本近现代史。

本书所叙述从1850年到1900年初的历史,是亚洲动荡的时代。这种动荡直接同亚洲今天面临的各种问题的根基联系着。亚洲各民族被迫拖进资本主义世界,暴露在欧美列强的侵略和掠夺之下。而各民族所有的阶级、阶层,都在由此引起的混乱中苦恼,彼此保持尖锐的对立,为了摆脱这种状态,发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力量。这一时期的日本历史,也是这种亚洲动荡的一环。从改造社会的暴动走向自由民权运动以至社会主义运动,从明治维新、开设国会以至走向甲午、日俄战争,国民的各阶级、阶层都鼓足干劲,激烈搏斗,这里可以说是大量蕴藏着多种多样的历史发展可能性的时代。世界资本主义体制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同这一动向紧密结合起来而形成了日本帝国主义这一规律,同时也是把那些可能性一个个地毁掉了的过程。

本书把直到1877(明治10)年的明治维新放在序章,作为问题的历史来加以考察,同1878年以后主要按编年史进行考察的第一章以下的叙述体裁,多少有些不同。著者另外出版了《明治维新》(岩波全书)、《明治维新和现代》(岩波新书),为了节省篇幅,采取了这种形式,这点请予谅解。尽量多加了注。由于是概括的叙述,只好直截了当地摆出历史的评价,舍弃了追究基本动向的一些

次要的东西。唯其如此，才试图把构成评价基础的史实和史料列举出来，希望读者在探讨具有复杂侧面的历史的具体形象上阅读原始史料，为此初步地介绍了史料的性质和内容。这里列举的史料都是公开出版的，其中大部分可在公共图书馆中看到。

远山茂树

1974年10月

序章 明治维新的特殊性质

印度佣兵之乱与太平天国

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是受资本主义列强侵略威胁的各民族，开始在世界各地同时掀起反抗和斗争的时期。由于在加里福尼亚和澳大利亚发现了金矿和进行殖民，以及中国和日本的开放门户，近代资本主义的世界市场圈乃告形成，同时这意味着被强制地、破坏性地纳入这个范围内的各民族的抵抗和斗争，必定要在相互关联之下爆发起来。二十世纪头十年，处于资本主义列强剥削和压迫下的亚洲各族人民的斗争，开始有了组织上的联系。早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的后半期，这些民族运动的领导者之间就有了频繁的往还。如后所述，甲午战后的一个时期，东京已俨然成了亚洲民族运动的据点。不过，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亚洲各族人民的斗争，总的说来是孤立地分散进行的^①。虽然无论在客观上或主观上，这种相互关联和团结，经过了缓慢而曲折的道路，但它的逐步加强却是这一时期以后的亚洲大势。

在抗租抗粮运动的普遍高涨中，太平天国军在1853年（日本嘉永6年）3月（即培理来航的三个月之前）进入南京城；英、法、美三国代表正在对苦于此次内乱浩大声势的清朝政府进行威胁，为扩大南京条约的既得权益展开强硬交涉，这时又以1856年10月在广州偶然发生的亚罗号事件为借口，计划行使武力。而阻碍其发动的是1857年（安政4年）（这时赫黎斯正在强迫幕府签订通商条约）印度佣兵和农民掀起的大叛乱。促使这次叛乱的条件是，英国为了侵略伊朗从孟加拉军区调走了部分白人部队，并为准备进

行亚罗战争在中国占用了些兵力。镇压佣兵叛乱之后，到1857年末，英法联军才攻击广州。第二年6月，天津被侵占，在天津条约签订一个半月之后，幕府被英法军胜利消息吓倒，签订了日美通商条约。

1860(万延元年)到1861年(文久元年)是东亚历史的转折期。太平天国的首脑发生了分裂和混乱，尽管如此，浙江三角洲地带的佃农在1857到1860年间的抗租斗争，乘清军失败而突然凶猛起来，眼看要使太平军满可进攻长江流域，并开创新的再生机会。然而农民斗争大都没有直接同太平天国结合起来，因遭到地主民团和清军的讨伐而被各个击破；太平天国的领导者们也改变了过去对农民的态度，决定在原来的农村统治机构上建立政权的方针，为此竟然容纳地方乡绅和地主的要求，对佃农的抗租斗争施行了镇压。于是中国的国内政局和对外关系便围绕太平天国——乡绅、地主——佃农间的阶级关系的变化发生了转变。

列强和封建政权的关系

1860年，利用清政府废除天津条约的动向，英法联军打进北京，10月签订了北京条约，规定天津开港，将九龙割让给英国和以关税为担保支付赔款。于是中国的开国已成定局，走向了沦为欧美列强的半殖民地的第一步。以签订北京条约和1861年11月由清除排外主义官僚势力的宫廷政变而开始的同治中兴为界限，欧美列强同中国的关系便固定下来了。这对中国方面来说，是同列强讲和对人民加紧镇压的路线；对欧美列强来说，是通过清政府实行掠夺和半殖民地化的路线。

于是欧美列强改变了利用内乱威胁清政府而采取的对太平天国的“中立”政策，当1862年1月太平军再次逼近上海时，租界的外国军队和清军为了防卫联合起来，组织起由美国军人华尔率领

的外国人义勇部队，同太平军进行了战斗。法国根据这种情况加紧了对印度支那的侵略，拿破仑三世为了对抗鸦片战争后英国在东亚取得的优势，企图侵略印度支那的军事行动，因亚罗战争的爆发推迟了；当这个障碍消除之后，从1861年起便加紧攻占南部印度支那，1862年6月，法国同阮王朝签订西贡条约，取得了南部越南的三省（交趾支那）和崑崙岛。于是阮王朝的官僚同法国的勾结明显化了，抵抗法国侵略的只有拥戴部分爱国官员的农民的斗争了。^②

总之，“由于对中国人民叛乱的恐怖，在变中国为英国殖民地所付高昂代价的战争中，英国兵力的不足，还由于有资本主义国家间的彼此矛盾（英国对法国，英国对俄国的对抗——远山）等，致使英国政府和其他各国政府对清政府和中国的封建统治者给以支持，只迫使中国作出部分让步就停手了。^③”这就是中国虽然逐渐陷于殖民地化，但总算还能勉强维持了主权国家地位的理由之一。

这种情况，对欧美列强同日本封建统治者之间的关系来说也是一样。1861到1863年的前半期，是由于尊王攘夷运动的压力和幕府企图实行限制开国影响的政策，幕府同欧美列强的关系更加紧张了的时期。能够摆脱这种关系的条件之一是，就欧美方面的对日政策来说，从“要使这个国家避免眼看就要陷于极其危险的内乱之中”的见地出发，采取“寄托希望于将来而实行妥协的政策”，对于废除日本的封建制，“与其通过外来的或自下而上的不可抗拒的压力，莫如经过自上而下的渗透过程”，即采取了通过封建统治者的自上而下的改革方针^④。

1860到1861年，对于英国内部来说，也是一个转变期。在经济上虽然是产业资本的全盛时期，而在政治上以对外战争为统治国民的必要手段的具有浓厚独裁气味的巴麦斯顿外交，由于财政负

担的加重和对法紧张关系的加剧失掉了国民的支持,以1860年签订英法通商条约为转机,格拉斯顿的以自由贸易政策为中心的外交得势了。于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以英国为顶点,在其周围形成了通过最惠国条约网而被纳入国际自由贸易体制的欧洲工业国,而在其外围则围绕着因不平等条约关系而沦为欧洲半殖民地的拉丁美洲、中近东、远东的农业国和英国的殖民地这一资本主义世界体制的双重市场结构^⑤”,其对东亚政策的重点也就放在稳定和维持这种局势上了。至少经过1873年以后世界慢性大萧条的持续,到开始向帝国主义过渡为止,世界资本主义体制才算有一个过渡的相对稳定时期。中国的同治中兴和日本的明治维新,都是这种世界历史条件的产物。

攘夷的原则化

欧美列强的压力和号称“中华”的中国的战败,促进了中国、朝鲜、日本三国封建统治者的意识形态—儒学,尤其主张严格区别华夷名分的朱子学的崩溃。在这之前,随着封建社会解体过程的进展,儒学已经开始变质,近代思想的基础正在形成,这是中、朝、日三个民族的共同点。从此以后,与上述的世界历史条件相结合,产生了一个对内自立、自强,对外顺应、从属两个侧面混为一体的新意识形态,成了封建统治者的主导思想。

早在明末清初,中国就出现了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等重视实证和经世实用的学派,从这个流派分出的清朝考证学之一的公羊学派中,出现了指出欧美侵略的危机,看到西洋文明的优越,提倡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魏源和林则徐等人;这种思想为主张对欧美列强从属以加强统治体制的洋务派所采纳。朝鲜也在十七世纪出现了实学派,出使清朝的朴珪寿受到亚罗战争的冲击,大讲列强侵略的民族危机和国家自强政策,起到从实学派向开化派过渡的

桥梁作用，但在他的思想和行动中，自强和从属这两个侧面也是混在一起的^⑥。开国的主张必然包括从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制这一因素，这是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的特色。因此，由封建统治者内部的改革派开展起来的批判开国论的政治运动，对于确定把从属性控制在一定限度内而实现富国强兵的政治路线就成为必要的了。

日本的儒学从十八世纪末以后，已经有了不拘泥于学派而采长补短的学风；不满足于训诂之学，提倡实践一经世说；以及重视实证和合理，吸取洋学的趋势等；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具备了适应开国的准备。在从华夷思想转化为开国思想上，日本比中国、朝鲜具有更为有利的条件。江户时代的日本本来并未隶属于中国宗主权之下，因而所受以中国为“中华”的华夷思想的束缚比较轻。中国因为实际上同周围的各民族保有宗属关系，尽管洋务派得势，统治阶层的华夷思想总的来说是凭惯性延续着；在朝鲜，由于长期处于中国宗主权之下，李朝后期试图原封不动地接受中国文化的小中华论，在两班的上层中还很强烈；而日本则不同。不仅如此，由于日本受培理来航的直接外部压力比中国晚了十多年，统治阶层从中国的鸦片战争以来的经验中取得了教训，尽管不很充分，却能够有了对付它的余裕^⑦。他们中的先觉者很快就从以文化道德的优劣来在名分上区别华夷内外的国际观，转变到以实力的征服或被征服的弱肉强食的国际观上来，从而得以通过为了海防；为了对抗欧美、征服邻近诸国，主张吸取西洋技术文明，以及为了了解敌国情况；为了争取充实武备的时间主张战略开国论等各种形式，从锁国思想一点点地转向开国思想了。尽管在幕府末期的政局中，攘夷派与开国派表面上斗争得很激烈，但开国论和攘夷论的接近和融合，却比中国和朝鲜都更顺利地实现了，这就形成了日本近代化的特点。

被视为幕府末期攘夷论的经典——后期水户派学说，虽然也承

认西洋各国武力优越，并且知道实际上必须同其压力进行妥协，但从原则上却坚决主张强硬的攘夷思想。水户藩领主德川齐昭采取了对内叫嚷攘夷，对外以和为宗旨的“内战外和论”，但后期水户学的特点在于“这种政治论在性质上已经成为控制民众和武士的一种策略了”^⑥。

攘夷论和攘夷运动具有二重性。先觉者和领导者一直把攘夷加以原则化，把它当作手段和策略来使用。先是作为激励士气和富国强兵的手段，后来作为倒幕的战术。不过，作为策略之所以收到效用，是因为在其基层中存在着越来越大众化的攘夷论。本来，华夷观念在身分制度的核心一君臣主从关系中是根深蒂固的，是和保卫领地的封建统治者所固有的排外主义风气一致的。这就使攘夷思想因受外患告急的冲击而渗透到全部封建统治者，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连处于统治机构最下层的村吏、豪商、豪农等被统治身分的上层也被卷了进来。他们以志愿攘夷为媒介，启发了当政者的自觉，放眼于超越藩界的全国政治，激起了越“分”地投身于批判和改革政治的运动的熱情，这就使武士阶级的群众性政治运动能够越出幕府官员、大名和藩的领导层的谋略范围而发动起来。不经过攘夷运动就不可能实现明治维新。此外，如果没有攘夷运动的领导者把武士群众和希望武士化的村吏、豪农、豪商的力量集结起来，加以操纵和利用，并把攘夷加以原则化、策略化，明治维新也不可能实现。如上所述，清朝的从属于列强，和因此而形成相互利用的关系之后的1863（文久3）年—1866（庆应2）年，是这种原则化和策略化的关键时期，这就使明治维新更容易实现了。

尊王与民众

攘夷论和尊王论都是由于使封建统治矛盾加深所造成的封建